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4.02.011

从考古与典籍中看冬虫夏草的传播与知识流变

陈思琪

摘要: 冬虫夏草是产自我国西部高寒山区、具有极高药用价值的珍贵物种。考古资料证明,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已开始食用虫草,而最早描述冬虫夏草的文献出现在公元4世纪。通过梳理藏医药文献与汉家典籍,寻找冬虫夏草的传播痕迹与人们对其认知的变化。文章聚焦于清代本草文献与文人笔记,结合著者身份经历、编撰方式、撰写内容等追索古人对冬虫夏草的认知随文本流变的脉络;同时经过各类典籍在内容侧重点与行文特点上的比较,揭示出医家与文人对于冬虫夏草认知上的异同,探索冬虫夏草在清代的传播情况。

关键词: 冬虫夏草; 医典文献; 文人笔记; 传播

中图分类号: G256; S567.3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24)02-0091-09

收稿日期: 2023-10-11

基金项目: 云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明清时期冬虫夏草的南亚东南亚传播与贸易研究”(项目编号: 2023J1082)。

作者简介: 陈思琪(1986—),女,云南个旧人,红河学院国别研究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文学、历史学, E-mail: 865250003@qq.com。

一、引言

冬虫夏草作为我国特有珍贵物产,已成为与人参、鹿茸齐名的闻名中外的滋补保健食品。冬虫夏草实际是一种寄生于蝙蝠蛾幼虫的特殊真菌,一般生长在海拔3 100~5 300 m的青藏高原及东缘横断山区的高寒森林与草甸区^[1]。有学者从与冬虫夏草有关的考古发现中将古人对虫草的认识与食用历史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并认为最早的医典记载出现在15世纪的藏医药文献《千万舍利》中^[2-3]。其实在15世纪以前,中国古代文人的笔记中已出现载有冬虫夏草的痕迹,很多学者认为唐代的《月王药诊》对冬虫夏草治疗肺病的功效进行了首次记载^[4]。随着中医药学与本草学研究在清朝进入兴盛期,出现了一批翔实记载冬虫夏草的本草古籍,将这些古籍置于清代本草学文献范围中进行考索,能够发现其潜在的发展脉络,借此

进一步明确此类书籍的价值地位,从而对载有冬虫夏草的本草著作进行界定与评估。此外,冬虫夏草还时常出现在清代文人的笔记小说中,考察文人笔记小说与本草古籍在对于冬虫夏草记载的侧重点的不同,能够深入揭示冬虫夏草在典籍文献中的传播情况与当时人们对冬虫夏草的认知变化。

二、考古发现中的冬虫夏草

日本学者小林义雄^[5]认为,在距今3000年以前,中华远古先民对虫草已有所认识;由于从殷代末期到秦朝的大约800年间,古人在安葬死者时会将一块美玉或精美石头放置在死者口中,这些玉或石头经人工精心打造而成,形状像蝉或蚕。据此,小林义雄猜测,当时的人们或许已经意识到虫草或蝉草比活体蝉或蚕更能长久地维持其形状的不变,若让死者口中含有状如虫草或蝉草的玉石,便能祈求死者在死后能身形完整。这说明古人或许已从生活经验中认识到虫草具有延年作用,让死者口中含有虫草形状的玉石,便是期盼死者来世能长生不老;古人也可能已观察到自然界中虫与草二者能相互转化的现象,从而产生了人能死生交替的企盼与愿望。虽然这仅是小林义雄的猜测,但并非毫无根据,玉石在古人眼中有通天地的作用,制作形状类似虫草的玉石让死者含之,应是具备某种象征意义的行为。

江西省考古研究所于2011年3月考察一处被盗汉墓,该墓被判断为西汉海昏侯墓。海昏侯刘贺为汉武帝的孙子,生前广罗财富。墓中出土的一万多件各色精美文物中包括一个装有疑似虫草的漆木盒,里面的虫草经两千多年掩埋却未腐烂与分解,且外形与现代使用的冬虫夏草基本一致。江西省考古研究所杨军研究员认为,虫草可能早在西汉时期就已成为名贵滋补药材。2017年7月23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杨大荣^[6]在青海玉树举行的冬虫夏草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指出:“中国食用冬虫夏草最早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西汉海昏侯时期。”反映出中国人民对于冬虫夏草的初步认识与食用经验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

三、清以前汉藏医典与文献古籍中的冬虫夏草

追溯清代以前有关虫草的古籍文献,发现早在公元4世纪的晋代,方士王嘉在其著作《拾遗记》中提及员峤山有一种类似冬虫夏草的“冰蚕”,称其“长七寸,黑色,有角有鳞,以霜雪覆之”^[7]。《拾遗记》是一本记录传闻逸事,对山川地理、动植物产有着细致介绍的古籍。虽然我们不能肯定这确系冬虫夏草,但从侧面说明了被冰雪覆盖的虫已进入古人的认知经验中。

李静^[475]依据藏语中称冬虫夏草为“牙儿札更布”这一名称出现在唐代医药古籍《月王药诊》中而认为此书是关于冬虫夏草最早的医药文献。公元710年,远嫁西藏的唐公主将梵文《月王药诊》译为藏文,其中记载了冬虫夏草能治疗肺部疾病的功效。《月王药诊》的内容主要以中医学为蓝本,把藏医的经验和藏医的理论增编进去,又吸收了天竺医药学的内容和理论。全书记载了一千多种中药和方剂,是藏医学的奠基之作,也是现存最早的古代藏医药著作。

藏医药文献中有关冬虫夏草的说法很多。公元8世纪比若杂纳所著的《本草秘诀汇集》中提及冬虫夏草的功效和配方,《藏本草》中记载了冬虫夏草具有“润肺、补肾”的功效;公元11世纪藏医药典籍《珍珠串注释日月之光》和《如意之树》也提及了冬虫夏草;公元15世纪,藏医药学家、藏医南派创始人苏卡尔瓦聂尼多杰^[8]所著《千万舍利》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冬虫夏草的生长环境、形态性味以及采集、储存

的方法,指明冬虫夏草生长于高山,夏天为草,根像虫子,性甘,能治“隆病”“赤巴病”等。入藏学佛受戒的蒙古医学家占布拉·道尔吉所著的《蒙药正典—美丽日饰》记载冬虫夏草:“生长于高山,夏季根似虫,叶状如山韭”,还附有一幅冬虫夏草子座的图^[9]。根据2002年《中华本草》(藏药卷),学界目前普遍认可《千万舍利》为最早记载冬虫夏草的藏医药典籍^[27]。

明代的汉文献中出现了类似描述冬虫夏草的痕迹,如《草木子》中描述了冬虫夏草的生存环境,称“雪蚕”生长在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阴山和峨眉山中^[476]。《草木子》所涉范围很广,其中涉及了动植物形态等知识,具有一定理论性和文献参考价值,书中特别阐释了万物由气化生的过程:“世间万物无不生虫。水木土之中。生虫至多……阴山以北,积雪历世不消。生蛆如瓠,谓之雪蛆。味极甘美。张子和医者著儒门事亲书。”^[10]部分学者认为这里提及的“雪蛆”指的是冬虫夏草,虽然无法确证这一猜测,但至少说明了在知识分子的认知经验里,虫生长在雪中并在雪中化生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现象。

从清代以前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来看,不管是殷代至秦期间以虫草作图案的玉雕装饰品,还是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虫草”样品,均说明古人对于虫草的认识和食用历史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公元4世纪的中国汉族文人笔记中偶尔出现类似于冬虫夏草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民间已具有冬虫夏草的认知经验,但因为所涉及的汉文献并非专业医书,而是带有想象成分的游记志怪类的博物志,所以除了描述冬虫夏草本身的形貌,关于它的药用价值还缺乏专业认识。以西部高寒山区为代表的西藏是冬虫夏草的主要产区,当地人是冬虫夏草第一手材料的采集者和使用者,所以西藏人民比中原汉族人民对于冬虫夏草有着更为理性的认识,他们在记录冬虫夏草的时候,往往偏重于药理功效方面,与汉族文人笔记小说相比,藏医药文献能够从其生长特点和药性药效上进行科学记载,没有太多的想象成分,但同样囿于传世文献不多,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不确定空间。

四、清代本草与文人笔记小说中的冬虫夏草

古人对冬虫夏草的认识伴随着中药医学与本草学的发展。清代考据学风气兴盛,对前人古籍的收集整理成为士人热衷的学术活动,关于冬虫夏草较为详细的记载也主要集中于这一时期。

(一) 载有冬虫夏草的清代文献情况

通过对典籍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有关冬虫夏草详细记载的汉医书出现得比藏医典籍《千万舍利》要晚很多,到了清朝时期的文献才比较集中地涉及有关冬虫夏草的内容。

最早明确介绍冬虫夏草的汉文献为雍正《四川通志》卷21“西域”篇“里塘”之物产部分,书中称其“出拨浪工山,本草不载,性温暖,补精益髓”^{[11]174}。

浙江人朱樟在西蜀为官期间撰写了《古厅集》,其中提及:“夏草冬虫,产化林坪,夏为草,入冬化虫,长三寸许,下趺六足,脰以上绝类蚕,羌俗采为上药,功与人参同。”^[12]袁栋撰于1744年的《书隐丛说》卷六记载了一件轶事:“昔有友人自远来,餉予一物,名曰‘夏艸冬虫’,出陕西边地,在夏则为草,在冬则为虫,故以是名焉。浸酒服之,可以却病延年。余所见时,仅草根之枯者,然前后截形状、颜色各别,半青者,仅作草形,半黑者,略粗大,具有蠕蠕欲动之意。”^[13]这些记录说明了清代人们已认识到冬虫夏草的产地、生长周期和一定功效。

乾隆二十二年(1757),吴仪洛编撰的医药名著《本草从新》是最早记录冬虫夏草的本草典籍。书中

将虫草划归在“草部”中的“山草类”，记载了其药性功效、生长特点与产地范围：“甘，平，保肺，益肾，止血，化痰，已劳嗽。四川嘉定府所产者最佳，云南、贵州所产者次之。冬在土中，身活如老蚕，有毛，能动；至夏则毛出土上，连身俱化为草。若不取，至冬则复化为虫”^{[14]36}。此条记录提及了冬虫夏草的品质等级，称产地在四川嘉定府的品质最佳，嘉定府涉及今天四川乐山市、峨眉山市、夹江县、洪雅县、犍为县、威远县和荣县等区域^{[11]91-92}。这里要指出的是，冬虫夏草的产地为青海、西藏、甘肃、云南和四川，贵州并不产冬虫夏草，这一错误可能与冬虫夏草当时已在贵州售卖有关。

1756年，清朝医药学家赵学敏所著《本草纲目拾遗》是第一本较为细致全面地介绍冬虫夏草的本草专著。书中将“夏草冬虫”归在“草部下”：“出四川江油县化林坪，夏为草，冬为虫，长三寸许，下跌六足，脰以上绝类蚕，羌俗采为上药。功与人参同。”^{[15]129}《本草纲目拾遗》在前人资料的基础上，增补了有关冬虫夏草的详细信息，其中明确了冬虫夏草的具体产地、形态以及功效。

对载有冬虫夏草的清代文献进行整理，能发现除了专业医家，文人的记载也越来越详细，反映出清代人士对冬虫夏草的认识进一步加深。檀萃《黔囊》记载：夏草冬虫者，出乌蒙塞外，暑苗土为草，冬蛰土为虫^{[16]35}。唐方沂在《青藜徐照》中记载：四川产夏草冬虫，根如蚕形，有毛能动，夏月其顶生苗，长数寸，至冬苗槁，但存其根，严寒积雪中，往往行于地上^[17]。唐秉钧在《文房肆考图说》中记载了一个故事，较为详细地描述了病人的病情以及冬虫夏草的药效：应奎书院山长孔老师……述伊弟患怯，汗大泄，虽盛暑，处密室帐中，犹畏风甚，病三年，医药不效，症在不起。适戚自川解组归，遗以夏草冬虫三斤，逐日和荤蔬作肴炖食，渐至愈。^[18]。满人椿园撰写的《西城见闻录》云：夏草冬虫生雪山中，夏则叶歧出，类韭，根如朽木，凌冬叶干则根蠕化动为虫。入药极热^[19]。

《本草纲目拾遗》还提及了徐昆的文言小说集《柳崖外编》云：滇南有冬虫夏草，一物也。冬则为虫，夏则为草。虫形似蚕，色微黄。草形似韭，叶较细。入夏，虫以头入地，尾自成草，杂错于蔓草溥露间，不知其为虫也，交冬草渐萎黄，乃出地蠕蠕而动，其尾犹簌簌然带草而行。盖随气化转移，理有然者。和鸭肉炖食之，大补^[20]。绍兴平莱仲先生言：其尊人曾任云南丽江府中甸司马，其地出冬虫夏草，其草冬为虫，一交春，虫蜕而飞去，土人知之，其取也有期，过期无用也。朱枫的《柑园小识》“春虫夏草”条载有：春虫夏草，生打箭炉，春生土中，如蚕，夏则头上生苗，形长寸许，色微黄，较蚕差小，如三眠状，有口眼，足十有二，宛如蚕形，苗不过三四叶。以酒浸数枚，啖之，治腰膝间痛楚，有益肾之功。以番红花同藏则不蛀。或云：与雄鸭同煮食，宜老人^{[15]130}。可见民间对冬虫夏草的认识日渐加深。

我国自古具有药食同源的养生医学思想，有关冬虫夏草炖老鸭的药膳做法也被记录于《本草纲目拾遗》中：“用夏草冬虫三五枚，老雄鸭一只，去肚杂，将鸭头劈开，纳药于中，仍以线扎好，酱油酒如常，蒸烂食之，其药气能从头中直贯，鸭全身无不透浹，凡病后虚损人，每服一鸭，可抵人参一两。”潘友新云：粤中鸦片丸，用夏草冬虫合鸦片人参合成，乃房中药也。此草性更能兴阳，则入肾可知。甘平，保肺益肾，补精髓，止血化痰，已劳嗽，治膈症皆良^{[15]130}。文中《从新》指的便是吴仪洛的《本草从新》。此外，文中引述自《药性考》的“味甘性温，秘精益气，专补命门”之语源自龙柏于1795年撰写的《脉药联珠》卷六“药性考”。赵学敏除了转引多位前人记述，还增加了自己对冬虫夏草的见闻和认识，《本草纲目拾遗》是清代有关冬虫夏草的本草典籍中记载得最为细致和全面的材料，且书中专门收录了冬虫夏草的药膳制法，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冬虫夏草逐渐为民间所认识与使用的过程

清代文人对冬虫夏草产地与药性的认识日渐加深，且往往用充满想象力的笔调对其进行生动描述。秦武域撰于1783年的《闻见瓣香录》记载冬虫夏草“出四川嘉州、打箭炉等处，夏则绿叶攒生，冬则其根蠕蠕欲动，土人剖而食之，云其性热，大滋补。”^[21]1790年，李心衡编撰的《金川琐记》卷六记载冬虫夏草：“俗称‘虫草’，初生，抽芽一缕如鼠尾，长数寸，无枝叶，杂生细草中。采药者须伏地寻择，因芽及根，虫形未变，头嘴倒植土中，短足对生，背有蹙屈纹，稜稜可辨。”^[22]金川位于有藏民居住的四川西北地区。陈樛刊于1804年的《樛散轩丛谈》记载道：嘉庆八年冬，余叔由四川秀县旋里，带归一物，其形类蚕，长经存，尾生草，长二寸许。问何物？曰：“此小金川所产，名‘冬虫夏草’。虫性忍寒，故冬月则到处蜿蜒，夏日则缩身入土，虫腹精液即化绿草，而从尾出。该草长一、二寸，虫乃死。”余求得数十枚，夸示于人。或曰：人患头痛，以此虫煎汤食之，立愈，永远不发^[23]。1845年，王培荀在游历四川后，在其《听雨楼随笔》记载了市场中售卖冬虫夏草的情况，并将其描述为：冬则虫，夏则草，市中所鬻但草耳，根似头，未有须，似其尾也。文中还附有两首诗：“何形毕竟是真形，为草为虫化未停。那似流萤终灭没，春风原上不重青”“居然小草宿根存，蠕动还能返本真。自有真机随变化，炎凉总不负天恩。”^[24]

清末，医家对于冬虫夏草的认识愈加深入，相关书籍还记载了冬虫夏草的采集与售卖情况。吴其濬出版于1848年的《植物名实图考》是我国第一部植物志类型的书，此书第10卷“山草类”介绍了冬虫夏草并附有一图，内容转自《本草从新》，又写道：“此草两广多有之，根如蚕，叶似初生茅草。羊城中采以饌，云鲜美，盖与啖禾虫同。”^[25]羊城指广州，广州的环境不可能产冬虫夏草，这条记录说明冬虫夏草在广州有售卖，或者是把其他种类的虫草如蝉花等误认为是冬虫夏草。

唐宗海撰于1893年的《本草问答》卷上有冬虫夏草记载：冬虫夏草……冬至生虫，自春及夏，虫长寸余，粗如小指，当夏至前一时，犹然虫也。及夏至时，虫忽不见，皆入于土，头上生苗，渐长至秋分，后则苗长三寸，居然草也。此物生于西蕃草地，遍地皆草，莫可辨识，秋分后即微雪，采虫草者看雪中有数寸无雪处，一锄掘起，而虫草即在其中^[26]。“西蕃”指陕西、四川、云南以西范围；虽“遍地皆草”有些夸张，但至少说明那时已有专门采挖虫草的人。

（二）载有冬虫夏草的清代本草文献的价值与地位

将载有冬虫夏草的清代本草文献置于清代医疗史与本草学的背景下，能够进一步明晰这类书籍的地位和价值，从而找出冬虫夏草在本草文献中传抄与流变的潜在脉络。

本草学在清代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体现在著述丰富、药物收集广泛、药物析理透彻、注重《神农本草经》的注疏阐发以及对李时珍《本草纲目》（简称《纲目》）体例和内容的吸纳等方面。《纲目》作为清代本草学研究的主要范本和素材，已成为众家撰写本草著作的参照系，对其进行辑录、考证和补充是很大一部分清代本草学家的创作宗旨与目的。笔者在本草古籍中搜索到的有关冬虫夏草的刊录记载与内容编排，发现著者大体上依据的是《纲目》分类体例与记述方式：首先将其归在一定的类别下，再分别按照药性药效、形状特点、产地范围等几方面逐一展开论述。

从著者编撰动机与整理方式上能够对载有冬虫夏草的本草古籍在清代本草著作中的价值与地位进行衡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本草书籍的内容层面来考察，能从中总结古籍的特点与冬虫夏草在当时的传播情况。

据统计,清代本草古籍多达四百多种,通过梳理载有冬虫夏草的部分,发现这些古籍具有内容简洁、实用性强的特点。有学者从内容领域上将清代本草书籍分为了七种类型:一是药性功效类,此类书籍作者多是专业医家。第二类是食疗饮膳类,这些书籍在民间普及度高,实用性强。第三类是临床专病类。第四类是资源品种类,这类书籍专业性强,具有考证价值。第五类是药材鉴别类,第六类是炮制制剂类,第七类是药性歌括歌,是作者出于普及或方便记忆的目的而编写^[27]。清代本草古籍中涵盖的内容反映出数量大、类别多、实用性强、普及性高等特点,以《纲目》为范例和主要参本的书籍,大多能广泛收集诸家论述,引经据典加以阐发,做到一定程度的理论创新,这类书籍系统性和科学性较强。

梳理后发现这些古籍作者的编撰动机主要在于搜集和补充众家本草知识,撰写内容分别侧重于资源品种与补遗类、药性功效类和食疗饮膳类三种。侧重于资源品种与补遗类的主要有吴仪洛的《本草从新》、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和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这类书籍对于冬虫夏草的记载较为全面翔实,具有重要的科学参考价值;侧重于药性功效类的是唐宗海的《本草问答》,著者既结合了传统哲学思想来解释药物的形成机理,又在内容上做到通俗畅达,有利于药物知识的普及推广;侧重于食疗饮膳类的是龙柏的《脉药联珠》,此类书籍因为涉及保健养生知识,在民间有着很高的普及度与实用性。

从涉及冬虫夏草内容记载的本草著者身份来看,主要为专业医者或儒医,他们熟读医书,具有丰富的医学背景,对著书立说抱持明确动机和严谨态度,因而他们所撰内容可信度高、专业性强。《本草从新》的著者吴仪洛自幼饱读医书,注重以儒家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来对药物性味疗效进行阐释。写就《本草纲目拾遗》的赵学敏继承了家族习医传统,注重对材料的广泛收集和补遗,药物品种资源与临床疗效记载得翔实而全面。吴其濬编撰的《植物名实图考》作为我国第一部植物志类型专著,著者不仅注重药物植物资源的收集、描述和补录,还加强了对物种的分类意识,体现出了著者明确的创作意图和科学倾向。《本草问答》的作者唐宗海作为专业医家和儒家传统知识分子,既注重对药物药效的析理,又注重药物的实际运用,使得书中形式与内容的编排通俗易懂。以上本草学著作对于冬虫夏草的介绍和描述代表了当时医家的认知水平,冬虫夏草作为新兴药物被收录在这类本草书籍中,通过书籍的流通在市场上得到普及,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它在民间的传播。

以成书年代来考察载有冬虫夏草的本草古籍,能发现书籍及其内容在历史传播过程中的流变情况。《本草从新》与《本草纲目拾遗》成书年代最早,分别为1757年和1756年;二者在编排方式与编撰体例上与《纲目》更为相近,且均强调对前人材料的收集补充,内容上显得完备,科学性与系统性较强,适于在专业学者和医家间流传。成书于1795年的《脉药联珠》,内容侧重于食疗饮膳,反映出医者越来越注重药物在民间的应用与普及,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专业领域的内容会逐渐在民间渗透,药物的实用性会得到加强。《植物名实图考》与《本草问答》成书较晚,1848年出版的《植物名实图考》注意植物分类的意义,说明在当时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国已受到西方分类学知识的影响与启发,开始从物种形态特征的比较与描述上初步鉴定物种品类。《本草问答》成书时间最晚,于1893年才问世,这一时期的中国已逐渐进入近代全球贸易市场,本草书籍的作者除了继续遵循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思维与记述方式,注重对药性功效的阐释以外,也更倾向于以灵活的形式和通俗的内容对药物资源进行介绍与普及。

对冬虫夏草进行过介绍的本草著作在内容侧重点、记述体例、行文方式上的差异实则体现了时代变迁对人们认知方式的影响。从雍乾时代到清代晚期,本草学家最初关注于冬虫夏草文献与临床经验收集、

整理、补充,依据《纲目》的编排方式进行刊录,行文严谨;之后越来越重视冬虫夏草的实际应用与普及宣传,到了清代晚期近代初期,本草学者们或许受到西方外来影响,初步具有了物种分类意识,且进一步看重药物的实用性,甚至采用灵活问答体的记述方式使得内容更加通俗,易于民间传播。

清代本草学的发展深受《纲目》影响,部分著书动机是为了增补、完善《纲目》中未涉及的药品材料以及对其他本草书籍的订正与补充,均要涉及对他人文献的引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本草文献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来自著者对前人或同时代学仁著作内容的摘录与转抄。如《本草备要》有关冬虫夏草的内容属于后人误窜加入之例,又比如《植物名实图考》中称羊城中能采集到虫草的例子需要加强订正之类。

总体来说,载有冬虫夏草的清代本草古籍均属于科学性与普及性较高的著作,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与临床实用价值,对这些内容按照不同的分类法进行梳理、归类和总结,能够明确这些本草书籍在清代整个本草学领域中的地位与价值,进而深入探索冬虫夏草随文本流变而在清代的传播情况。

(三) 载有冬虫夏草的清代文人笔记小说与本草著作之比较

文人笔记史料和各级地方志文本等社会生活史料也是清代医疗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这与清代民间医学的普及与发展存在密切关系。清代从医人数众多,学医与从医蔚然成风,出现了“医风大振,比户皆医”的现象^[28]。普通的粗通文理之人也会对医书有所涉猎,有一部分医者是为了继承家族从医事业,例如著名医家赵学敏便是继承父命去医学的例子;一部分文人是由于科考不利而弃文从医,由于治病救人的职业在当时为人所尊重。儒医在撰写医书的过程中运用的思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式,他们在解释冬虫夏草的生活史时,广泛运用的是阴阳气运化生说的观点。另一方面,尽管清代从医人数增多,但由于清代取消了医学教育和考核制度,从而造成了医学群体中良莠不齐的情况;学医的人虽然很多,但所学内容浅显,未受过专业训练,这批人只是为了生计而进入医疗市场,甚至存在相当数量的“走方医”

清代民间医学兴盛的时代背景也反映在文人创作中,文人笔记小说的作者虽然不是专业医家,但他们在记述游记见闻的内容中也时常会涉及民间药物药效的描述与介绍。这部分内容记载了文人自身或亲友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和可参考性,且经过文人文笔的渲染,往往比医书中的记载显得更加生动神妙,体现在尽管古人对冬虫夏草的生活史认知不全,一般会以想象的形式来作补充,但本草著者和文人作家在阐释其形成机制时,想象程度是不同的。本草著者用相对客观的语气叙述冬虫夏草会“冬在土中,身活如老蚕,有毛,能动”^{[14]36},而文人作者往往将其描述得更加鲜活灵动:“根如蚕形,有毛能动……严寒积雪中,往往行于地上”^[17];又如“交冬草渐萎黄,乃出地蠕蠕而动,其尾犹簌簌然带草而行”^[20];又如“虫性忍寒,故冬月则到处蜿蜒”^[23]等,这些笔记见闻中均把冬虫夏草的虫在冬天移动的声音形貌描述得栩栩如生,宛如眼前,可见文人作家的行文是比本草著者的客观记载更富有想象力和生动性的。

清代记载冬虫夏草的文献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文人笔记、游记掌故,另一部分是方志、本草文献,二者记述内容的侧重点不同。方志、本草古籍中记载的冬虫夏草,医家多从产地范围、生长特点、形状样貌、形成原理、采集方法与性味药效来进行介绍。值得注意的是,医家在描述冬虫夏草的生长情貌时,会对其生长机制做适当阐释,首先,医家认为冬虫夏草会在不同的生长周期生死化生,如《本草从新》所述:“冬在土中,身活如老蚕,有毛,能动;至夏则毛出土上,连身俱化为草。若不取,至冬则复化为

虫”^{[14]36}；其次，会进一步从传统哲学思想中解释其形成原因，如《本草问答》中将冬虫夏草的形成原因阐释为“冬夏二令之气化”^[26]。文人笔记与随笔小说中，冬虫夏草往往被描述得更加形象生动，作者侧重于传闻轶事的搜罗，将其生长形态想象得更加神秘，认为冬虫夏草的虫是“会动”的活体；有部分文人还注重收集民间冬虫夏草的各类食用方法，补充了本草著作中食疗部分的内容。

冬虫夏草出现在清代文人笔记中的次数多于其出现在本草医典中的次数，反映出冬虫夏草已在当时民间乃至全国范围内传播，世人能从各类见闻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冬虫夏草。无论医家还是文人，在描述冬虫夏草的生长周期或在解释其形成的原理时，都认为其可以在不同的季节感气化生为虫或草，虫或草依据季节循环而不断相互转化。他们一致认为虫是活着的，若冬季不将其采集，虫又会化生为草。这种万物感气不断循环化生的观点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于宇宙万物的思考方式是离不开的，显示了冬虫夏草这一名称本身暗含着的中国传统文人在漫长历史长河中逐渐累积形成的哲学观和生命观。

五、结论

冬虫夏草出现在相关学者对于考古文物的阐释中，出现在唐代以前文人游记见闻或传说故事中，对于文物意义和文人故事内容的理解带有后人很大的想象成分，经后人不断地解释和渲染，往往给人们造成冬虫夏草在非常久远的时代已广为人知的假象。然而，严谨考证后发现，关于冬虫夏草的正式记载是从藏医药文献《千万舍利》开始的，说明冬虫夏草最先进入的是藏民的视野，这与它自身产地有关。汉医药文献的记载，晚至清代雍乾年间才相对广泛地出现。梳理清代本草文献与文人笔记小说中记载有冬虫夏草的内容，分别从作者身份、编撰方式、内容分类等方面探究本草著作的地位与价值，追索冬虫夏草在历史变迁中随文本流变，从专业性、科学性向普及性、实用性转变的过程；揭示出专业医家与文人作家对于冬虫夏草认知上的异同：一方面，冬虫夏草广泛出现于清代文人笔记中，说明了冬虫夏草已在民间普及与传播；另一方面，从医家与文人对于冬虫夏草感气不断循环化生的观点有着一致性，体现出了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相似的哲学观和生命观。

参考文献：

- [1] 代永东. 青藏高原东南部冬虫夏草及其近缘种分类与谱系地理研究[D]. 昆明: 云南大学, 2018.
- [2] 芦笛. 古代汉藏文献所载冬虫夏草研究[J]. 西部学刊, 2014(2): 71-75.
- [3] 王莹. 古文献对冬虫夏草的记载考释[J]. 中国食用菌, 2019(12): 115-116.
- [4] 李静. 我国古代文献中冬虫夏草的考辨[J]. 中国食用菌, 2019(4): 75-77.
- [5] 常章富, 高增平. 冬虫夏草[M].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4-5.
- [6] 罗云鹏. 中国食用冬虫夏草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海昏侯时期[EB/OL]. (2017-7-25)[2023-12-01]. https://www.cas.cn/cm/201707/t20170725_4609667.shtml.
- [7] 王嘉. 拾遗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363.
- [8] 拉姆, 布罗顿珠, 米久. 冬虫夏草的研究进展概述[J]. 西藏科技, 2021(10): 12-14.
- [9] 占布拉·道尔吉. 蒙药正典—美丽目饰[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282.
- [10] 叶子奇. 草木子[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13.
- [11] 黄廷桂. 四川通志[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 [12] 朱樟. 观树堂诗集合刻·古厅集[M]. 清乾隆年间[1736-1795]刻本.

- [13] 袁栋.书隐丛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86.
- [14] 吴仪洛.本草从新[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 [15]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 [16] 檀萃.黔囊[M].贵阳:贵阳文通书局,1943:35.
- [17] 芦笛.《青藜徐照》、唐方沂和夏草冬虫综考[J].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2015(1):1.
- [18] 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M].乾隆四十三年刊本.
- [19] 七十一.西城见闻录[M].乾隆四十二年刊本.
- [20] 徐昆.柳崖外编[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23.
- [21] 秦武域.闻见辨香录.山右丛书初编:第10册[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153.
- [22] 李心衡.金川琐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64.
- [23] 陈鏞.樗散轩丛谈[M].同治三年刻本.
- [24] 王培荀.听雨楼随笔[M].成都:巴蜀书社,1987:349.
- [25] 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242-243.
- [26] 唐宗海.本草问答[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19.
- [27] 陈仁寿.浅谈清代本草古籍的特点与整理要点[C].中华中医药学会第十五次中医医史文献学术年会论文集,2022:113-115.
- [28] 张璐.张氏医通[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1.

Study on the Spread and Change of *Ophiocordyceps sinensis* Knowledge from Archaeology and Ancient Documents

CHEN Siqu

Abstract: *Ophiocordyceps sinensis*, a precious species with extremely high medicinal value, is grown in the alpine mountains of western China. Archaeological data prove that ancient Chinese began to eat Cordyceps as early as 2,000 years ago, and the earliest documents recording Cordyceps appeared in the 4th century AD. This paper combs through Tibetan medical documents and Han People's ancient documents to trace the spread and change of people's knowledge of *Ophiocordyceps sinensis*. It focuses mainly on Qing Dynasty's materia medica literature and literati notes, and traces ancient people's knowledge development of *Ophiocordyceps sinensis* with the change of document texts based on authors' identities, experiences, and writing methods and contents. Meanwhile, through comparison of content focus and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various document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doctors' and literati's knowledge of *Ophiocordyceps sinensis* are revealed, and the spread of *Ophiocordyceps sinensis* knowledge in the Qing Dynasty is explored.

Keywords: *Ophiocordyceps sinensis*; medical documents; literati's notes; spread